

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

唐明贵

(聊城大学 哲学研究所,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自清末以来,在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音义》等《论语》注本,学者们通过对这些《论语》注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见解。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唐写本;《论语》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1-0032-03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行录,是中国古代普及程度甚高的一部儒家经典。从汉代起,攻治《论语》亦称为历代经师究心的重要论题。研究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论语》注本,可以从一个侧面剖析某个时代的经学特色及社会思潮特色,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思想的逻辑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自清末以来,在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音义》等《论语》注本,通过研究,学者们发现这些《论语》注本,不仅可以弥补现存史籍记载之缺,而且有助于厘清某些聚讼不已的学术纠纷。

一、唐写本《论语音义》研究

唐写本《论语音义》,藏北京图书馆,编号为殷42,许国霖《敦煌杂录》有录文。该写本残存八行,前两行下端残损,后四行上端残缺,仅存音义42条。经过比对勘校,许建平认为此音义底本是郑玄《论语注》。他把写本《论语音义》与十三经注疏本何晏《论语集解》相对照,发现残存的42条音义中,23条为《论语集解·公冶长》正文之音义,另19条为注文之音义。但这19条注文音义中,12条为《论语集解》所无,因此他认为该写本音义之底本,一定不是何晏《论语集解》。他又将其与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唐景龙四年下天寿抄孔氏本郑氏论语注》和19号墓《唐写本郑氏论语注·公冶长篇》有关章节对照,发现两者正注文吻合无间,故他确认写本音义所据底本乃郑玄《论语注》,并将其命名为《论语郑注音义》。

在此基础上,许氏又结合《隋书·经籍志》“《论语音义》二卷,徐邈等撰”的记载,进而得出“历史上为《论语》作音的,非仅徐邈一家,乃有两家”的结论,较为圆满的解释了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中出现的注明来历的数百条与徐邈音系不合的反切的情况。陆氏《论语音义》所引非仅徐邈一家,那些不明来历的几百条反切应出自别家《论语音》。^[1]许

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学以及陆德明的《论语音义》,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唐写本《论语集解》研究

20世纪以来,敦煌及吐鲁番等地先后出土唐人写何晏《论语集解》单行本六十余件,国内外学术界目之为希世瑰宝。“以之与皇本、邢本对校,不仅可以订正传本中的许多错误,解决清人研究中的许多纠纷,还可以提供传本中没有的许多佚文,披露清人研究中未曾涉及的许多新的问题。”^[2]而其中尤以伯3271号写本的意义为大。该写本共存35行,前12行上半部均残,第13行上半部亦稍残,存《论语·乡党》“足蹈踣如有循”至篇末。“写本经文单行大写,注文双行小写,格式一同《集解》其它写本和传本,不同的是,注文内容远较《集解》为多,大约有九处多出注文。”多出的九条注文中,六条与皇侃《论语义疏》所引江熙、范宁、栾肇、缪协注同,三条不知出处。李方女士结合出土情况、史籍记载和伯3271号写本自身情况,认为不知出处的注文“很有可能是根据皇疏补入的,只不过今本皇疏脱此二注”,无法证明罢了。

李方经过对校,还发现写本并未将皇疏中的他家注全部补入,且“写本或于《集解》无注处补注,或于《集解》注下加注,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似乎全凭抄者的喜好和需要。而所有补入的他家之注,均不标明著者,极易使人误将无注处之注视作何注,有注处之补注视作《集解》原注之延长”。因此,“伯3271号写本并非纯粹的《论语集解》,它实际上是在《论语集解》的基础上,根据皇疏补入了他家注的具有混合性质的《论语》集注写本。”^[3]这一发现,在《论语》学发展史上、乃至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伯3271号写本率先在何晏《集解》中合并皇疏他注,开合并注疏之先声,纠正了学界普遍将南宋初年作为“经注正义合刻”开端的错误观点。

收稿日期:2004-08-19

作者简介:唐明贵(1971-),男,山东临清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学史。

三、唐写本皇侃《论语义疏》研究

敦煌石窟皇侃《论语义疏》(伯3573号)写本残卷,存《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四篇,《学而》的“学而时习之”章稍残,《里仁》仅至“事父母几谏”章。共649行,16000余字。写本卷端虽用后梁贞明九年(923)公文纸托裱,又有后梁龙德年号。然据卷内文字均避唐讳,知实为唐人写本。

敦煌学专家王重民把写本与知不足斋翻刻本作比较,发现刻本有多处溢出写本的部分,王先生把这一部分斥之为日本人所窜入,“凡知不足斋本较敦煌本溢出疏语,姑视为日人窜入旧说,盖无不可也。”并推论云日本刻本是日本人的改编本,敦煌写本才是皇侃《论语义疏》的原形。^[4]

李方女士对此持不同意见。她说,说刻本溢于写本的部分均为日人所窜入,不能成立。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刻本多于写本的所谓李充等“十三家注”。写本所存三十八章,引江熙《集解论语》比刻本少二十来处。其中包括李充“君子无所争”章、“关雎”章之说,孙绰“吾十有五”章、“管仲之器”章、“仪封人请见”章之说,王弼“吾十有五”章、“林防问礼”章之说,范宁“贫而无谄”章、“君子无所争”章之说,以及郭象等人之说。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及《玉函山房辑佚书》等书考证,李充等人“《论语》注”以及江熙《集解论语》十卷,两《唐志》、《经典释文》有载,而《宋史·艺文志》无载,北宋时已亡。又《日本国见在书目》仅载《皇疏》十卷,证明江熙《集解论语》、李充等人“《论语》注”并未流传到日本。也就是说,他们的注,日本人不可能窜入或者伪撰。因此,刻本的真实性不容怀疑。

接着李方对写本的性质进行了探讨。她通过对比武内义雄刻本(武氏刻本与知不足斋翻刻本内容大体一致,只是体式方面有所区别)与写本的体式、经文、注文、疏文,发现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写本不仅省略了大量的经、注、疏,且分章、合章较随意,因而该写本不会是皇侃《论语义疏》的原形。在她看来,该写本很可能是一件皇侃《论语义疏》的讲经提纲。因为,第一,写本每章经注之后,均有一段总括文。总括文以“此明”二字开头,总括全章经注大意。这是刻本所没有的。写本作者自撰总括文,用以提纲挈领阐明经文大意,符合讲经提纲的要求。第二,写本还有一些刻本所未有的提头语,这些也符合讲经性质。如“学而时习之”章的“仰解朋友者”、“导千乘之国”章的“仰解节用爱人者”、“曾子曰慎终追远”章的“仰解慎终、追远二事者”等等,以“仰解……者”概括的提头语,很明显,都是讲授之语。第三,写本疏文中还有一些明显不属于皇侃本人而属于讲经师的文字。如“季氏旅于泰山”章,经、注均未涉及泰山与鲁的关系,唯刻本疏云:“泰山,鲁之泰山也。”写本无此疏,而有“何知泰山在鲁家?泰山者,诗云:‘泰山岩岩,鲁邦所瞻’”一段。此段明显是讲经师解释《皇疏》的文字。又如,“禘自既灌”章写本有“先儒说灌法不同,依疏明显者”一句,明确表明作者决

不是《皇疏》原形的著者,而是独立于疏外的讲经师。^[5]

此一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中国古代经学传授,向以师徒口耳相传为主,所以经师讲经提纲无流传于今者,致使我们对古代的讲经一直缺乏深入的了解。敦煌出土唐写本《皇疏》被证明是一件讲经提纲,对经学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事。

四、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

自20世纪以来,在敦煌千佛洞和吐鲁番阿斯塔那27号墓、85号墓、363号墓、184号墓出土的文书中先后发现了多件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它们分别是:英国斯坦因文书中编号为3339的《八佾》篇(残存21行)、英国斯坦因文书中编号为6121的《雍也》篇之篇尾和《述而》篇之篇首(残存9行)、法国伯希和文书中编号为2510的《述而》、《太伯》、《子罕》、《乡党》四篇(残存224行),日本大谷光瑞文书中(编号不详)的《子路》篇(残存九行)。阿斯塔那写本《公冶长》篇(残存60行)、《为政》篇至《公冶长》篇178行、《雍也》篇66行。这些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引起了中日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著。

其中论文主要有:罗振玉的《〈论语〉郑氏〈子路篇〉残卷跋》和《〈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跋》(《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王国维的《书〈论语郑氏注〉残卷跋》(《观堂集林》卷四)、王重民的《〈论语〉郑注〈八佾篇〉叙录》(《敦煌古籍叙录》)、陈铁凡的《敦煌〈论语〉郑注三本疏证》(《大陆杂志》1960年20卷10期)和《敦煌本〈论语〉异文汇考》(《孔孟学报》1961年第1期)、王素的《敦煌文书中的第四件〈论语郑氏注〉》(《文物》1984年第9期)、文物出版社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文物》1972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的《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校勘记》(《考古》1972年第2期)、日本学者尾崎雄二郎的《关于敦煌写本论语郑氏注和何晏论语集解所保存诸注与所谓孔安国注的关系》(京都大学教养部《人文》第6期,1959年)、熊谷尚夫的《敦煌出土孔氏本郑氏注论语的研究》(《横滨国立大学人文纪要》16期,1970年3月)和《卜写本论语郑注考》(《加贺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文史哲学论集》,1979年3月)、月洞让的《关于〈论语郑氏注〉》(《汉文教室》106号,1973年5月)等。^[6]

专著有两部,分别代表了日本和中国大陆学者研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最高成就。一部是日本学者金谷治教授的《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平凡社,昭和五十三年五月出版),该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学者研究卜天寿写本的文章(仅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所撰校勘记中附有金谷治教授个人的校勘心得)。第二部分为金谷治教授所撰在中国之外散藏的五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的校勘记。第三部分为金谷治教授研究郑玄与《郑注》的专题论文。该书图文并茂,把唐写本《郑注》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起点。^[6]一部是大陆学者王素的《唐

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该书是在金氏本的基础上,对吐鲁番文书中另外二十几件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进行研究,综合而成的。该书正文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较为全面的唐写本《郑注》校录,下卷为早期和近期国内外唐写本《郑注》研究的论文。正文之外,是已经发现的唐写本《郑注》残卷的全部图版。王本成为唐写本郑玄《论语注》残卷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在这些论著中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关于《论语郑氏注》残卷中有些篇题之下写有“孔氏本,郑氏注”的问题。罗振玉认为郑玄仅据《古论》以正《鲁论》,而没有用《齐论》校正《鲁论》。他说:“今此卷明著‘孔氏本’,一若所注为《古论》者;而考其篇次,则‘太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固明明同《鲁论》,知何序、皇注为可信。顾孔训世既不传,此卷乃题孔本,初不可晓。且陆氏《经典释文》亦言,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与何、皇说略同。乃反复考之,《释文》所举郑氏校正诸字,则皆改《鲁》从《古》,无一从齐者,始悟此卷所谓‘孔氏本’者,乃据孔氏《古论》改正张侯《鲁论》;而何、皇诸家谓考校《齐》、《鲁》者,盖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见《集解序》)。郑君既注于张《论》,则不异兼采《齐论》,其实固仅据《古》以正《鲁》也。此卷写官漫题孔本,虽不免小疏,然因此而得知其实,亦可喜矣。”^[7]

王国维认为郑玄《论语注》篇章全从《鲁论》,字句全从《古论》即“孔安国本”,后者是称郑注《论语》为“孔氏本”的原因。他在《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中说:“郑氏所据本固为自《鲁论》出之《张侯论》,及以《古论》校之,则篇章虽仍鲁旧,而字句全从古文。《释文》虽云郑以《齐》、《古》正读凡五十事,然其所引廿四事及此本所存三事,皆以《古》正《鲁》,无以《齐》正《鲁》者,知郑但以《古》校《鲁》,未以《齐》校《鲁》也。又,郑于礼经,或从古文改今文,或以今文改古文,而正《论语》读五十事中,所存二十七事,皆以《古》改《鲁》,无以《鲁》改《古》者。故郑注《论语》以其篇章言,

则为《鲁论》;以其字句言,实同孔本。……此本直题为‘孔氏本’,虽篇章之次不同,固未为失实也。”^[8]

文物出版社在《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中指出,由于郑玄以孔安国《古论语》为底本,所以称为“孔氏本”。^[9]

日本金谷治教授则不这么认为。他指出:郑注并非直接将《古论》作为底本,如果郑玄把自己的注本称作“孔氏本”,则明显与理不合。在他看来,“‘孔氏本’这一名称,可能是知道‘郑玄本’与‘孔氏本’相类似的后人,在纯粹的《古论》失传之后加上去的。这也许与《隋书·经籍志》所载‘梁有古文论语十卷,郑玄注,亡’有关”。^[10]

王素对金谷治教授的推测表示赞同,并在此基础上对“孔氏本”的源流予以了探讨。他通过分析唐写本郑玄《论语注》的篇题得出唐代西北边疆地区流行两种郑玄《论语注》,标“孔氏本”的写本与不标“孔氏本”的写本,二者内容虽完全一样,但标与不标,从写本源流看却存在很大区别。不标“孔氏本”的写本原是北朝流行的本子,标“孔氏本”的写本原是南朝流行的本子。前者即是《隋志》著录的“《论语》十卷郑玄注”,后者即是《隋志》披露的“梁有《古文论语》十卷郑玄注”。理由有二:一是高昌国曾与梁朝交通,从梁朝引进过《论语》等儒家经典。二是“孔氏本”从未在北朝及隋唐中原地区流行,却在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有较长的流行历史。^[11]

以上诸说中,王素之说虽不能视为定讞,但该说有理有据,较之他说尤为可信。

由上可见,敦煌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仍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流传于敦煌地区的唐写本《论语郑注音义》为什么不见于唐代史籍记载?唐写本郑玄《论语注》与现存《论语集解》所引郑注不一致,而与所引它注多一致之处,为什么?唐写本中,“孔氏本”《论语郑氏注》和非“孔氏本”《论语郑氏注》都是四卷本,与隋唐史籍记录十卷本均不相符,原因何在?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学界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许建平:《北图藏殷 42〈论语音义〉残卷跋》,《敦煌吐鲁番研究》1997 年第 2 卷。
- [2] 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 [3] 李方:《伯希和 3271 号写本〈论语集解〉的性质及意义》,《敦煌研究》1995 年第 4 期。
- [4]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一“经部”。
- [5] 李方:《唐写本〈论语皇疏〉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文物》1988 年第 2 期。
- [6]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前言》,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2—274、2—3 页。
- [7] 罗振玉:《〈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跋》,见郑学檬、郑炳林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献卷》第二册,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年影印版,第 2 页。
- [8] 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观堂集林》第一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69—174 页。
- [9] 文物出版社:《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文物》1972 年第 2 期。
- [10] 金谷治:《郑玄与〈论语〉》,见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8 页。
- [11] 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校读札记》,见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4—248 页。

(下转第 41 页)

刘安及宾客的有关作品绝大多数已散失，现在完整流传下来的仅《淮南子》《招隐士》《谏伐南越书》，另有后人所辑著述若干。

参考文献：

- 张双棣.《淮南子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 王云度.《刘安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费振刚等辑校.《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
-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郑文.《汉诗研究》[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7 年赵逵夫主编《诗赋研究丛书》本
- 郑樵，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孙启治，陈建华编.《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赵逵夫.《古典文献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科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学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简体字前四史本，2005.
- 魏征等.《隋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 房玄龄等.《晋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 刘昫等.《旧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 欧阳修等.《新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 脱脱等.《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Liu An and His Guests' Works Outline Research

QI Zi-y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Ancient books and codes record the Western Han Dynasty's king of Huai Nan and his guests' works name has 49 kinds. After analyze relevant literature, we find there are one book but has different names and later generations forged have many kinds. Comparatively dependable works of Liu An and his guests' works have 20 kinds. The article classify this works to academic books and literary works two categories, and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theirs names, volume numbers, historical condition of exist and spread and lost, distinctly reflect Liu An and his guests' works change in the history.

Key words: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King of Huai Nan; Scholar group; Works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上接第 34 页）

Study on the Dunhuang and Turpan Manuscripts of Lun-yu Annot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TANG Ming-gui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Research,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 lot of manuscript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belonging to the Tang Dynasty were found in Dunhuang and Turpan,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Lun-yu in the vernacular, Zheng Xuan's *Lun-yu-zhu*, He Yan's *Lun-yu-ji-jie*, Huang Kan's *Lun-yu-yi-shu* and *Lun-yu-yin-yi* etc. Researching these texts, the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educe lots of new opinion.

Key words: Dunhuang and Turpan; Manuscript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本刊 2005 年 5 期李磊《侯子钦墓志释考》为华东师范大学 2005 年优秀博士研究生培养基金资助项目（PHD Program Scholarship Fund of ECNU 2005）阶段性研究成果。